

# 編後語

改革開放的偉業到了而立之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令人驚奇而具有震撼力的變化就是國家的轉型。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襲擊了天府之國。年近古稀的共和國總理在幾個小時後在災區出現，15名傘兵從近5,000米的高空冒着生命危險空降到地面交通隔絕的災區，中國政府第一次為遇難的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所有這一切都顯示，國家的轉型已經發生並將繼續發生。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挖掘中國三十年發展奇跡背後的故事。四篇文章的視角大相逕庭，但其共同點在於重點考察了政府的定位，以探索國家轉型的走向。中國的傳媒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國家的一部分，因此學術界傳統上以「喉舌」或「宣傳型國家」的概念來為中國傳媒定位。然而，趙月枝描繪出中國傳媒走向「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的曲折之路。一方面，中國的傳媒業走上了市場化、全球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國家依然通過選擇性政治策略的運用，將部分人群、地區、部門或者議題排斥在市場的邏輯之外。作為國家轉型的一個部分，中國傳媒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現了新的面貌。中國的傳媒政治是否由此走上一條新的轉型之路呢？

在中國的經濟奇跡面前，很多正統的經濟學理論顯得蒼白無力。姚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論證了中國經濟奇跡的背後在於一個「中性政府」，即不偏袒也不依賴於任何特定社會利益群體的政府。這一論證，同發展社會學和發展政治學中的「國家自主性」理論，交相輝映。該理論認定，一個超脫於社會利益群體的國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因素。在市場轉型的大變局中，中國政府是否構成這樣一種具有「自主性」的「國家」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大課題。

潘毅和任焰分析了農民工遲遲無法實現「無產階級化」（也就是「產業工人化」）的過程。儘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繁多，但是國家的缺位或者扭曲，是重要的貢獻因子。從馬克思主義勞動社會學的視角，兩位作者揭示，農民工勞動力的再生產離不開一系列社會制度安排的建構，而這一建構離不開國家扮演主動而積極的角色。事實上，歷經長時期的缺位之後，中國政府在近年啟動了全面的社會制度建設。在很多地方，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似乎起步了。

住房制度改革是社會制度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王天夫和李博柏從新制度主義的角度，細緻地刻畫了隨着住房制度的改革社會衝突從單位體系不斷外化的演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最具有挑戰性的課題，是政府如何建立新的制度，來調整社會大變革之後出現的新社會衝突。

與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比，汶川大地震對於學術界的震撼力，無疑更巨大而深遠。無論是國家的大轉型，還是社會的大轉型，都在這場大災難中以異乎尋常的方式顯示出來。學者們必須以異乎尋常的速度，來追尋中國轉型的腳步。